

新中国70年来的共富实践:历程、经验和启示

邱卫东,高海波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规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新中国70年来的共富实践可以分为初步探索、全方位提速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国奠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后两个阶段,我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道路。回顾70年来的共富实践历程,党和国家已经在探索、开发和驯服资本的过程中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完善了驾驭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和财富分配体制机制,并将逐步实现把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的庄严使命。尽管如此,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具有新时期特点的伟大斗争,这聚焦在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资本逐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被国际资本力量盘剥的风险等三个方面。为解决上述矛盾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践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陆续规划出理论、实践和战略维度的共富方案,这是党和国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布局。

关键词:新中国70年;共同富裕;资本批判;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9)02-0005-07

新中国70年来面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全方位探索。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构建了系统完备的工业基础和国防体系;但也因计划经济体制过度拒斥资本和市场等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素而阻滞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创新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赓续完成了将资本、市场等现代化共富要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链接的使命,进而在利用、开发、引导、控制、节制、规范和驯服资本中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就目前来讲,我国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征程中仍面临着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和被各类非公资本盘剥的危险,贫富差距、利益固化、权钱勾结、功利主义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就是在上述矛盾挑战中生成的。因此,在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

梳理并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共同富裕的基本经验,将有助于我国摆脱由资本秉性导致的各类现代化发展悖论,探索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一、历史演进:新中国70年共富实践的脉络梳理

新中国70年来的共富历程分为初步探索、全方位提速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的认识图式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资本占居在社会主义共富实践中的逻辑序列位置也以更加明晰的样态呈现出来。

(一)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富实践的初步探索阶段

我国在此阶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构建了系统完备的工业基础和国防体系。1949年到1953年期间,“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财富发展模式”在我国

作者简介:邱卫东,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哲学;高海波,男,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5ZD007)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本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逻辑研究”(项目编号:2016FZX002)的阶段性成果。

占主导地位,这种模式主张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1]政策促进了“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的分工合作并加速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1953年到1956年期间,我国在“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上,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财富发展模式”转向了“苏联模式”的财富发展方式。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我国“劳资两利”、“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财富发展样态已让位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达到90%以上,我们也在集中国家力量仿效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和国防成果。1956年到1966年期间,党和国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时代命题,有了诸如“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3]的新判断。但1966年到1976年期间,我国在道德挂帅、政治挂帅、斗资批修的意识形态洪流包裹下开展了十年“文革”运动,财富发展问题完全转化为阶级斗争问题,这种全局性的错误造成了中国共富实践历程中的最大波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共富实践的全方位提速阶段

我国在此阶段把资本纳入到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最大化运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驾驭和导控资本,为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条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发展道路。1978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重新将市场和资本拉入科学和理性的共富轨道并逐步实现了二者的双向链接,进而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前提和手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变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后,我国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共富逻辑中涤清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共产主义的误解。1982年我国出台了首个农村工作的文件,果断从最薄弱、受压抑最严重的农村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我国社会财富发展实践中的重要一环。针对个体私营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这个判断指明了个体经济对社会发展所作的突出贡献。在探索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中,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5],此后广大人民群众被意识形态压制的财富欲望被深层次的激发出来,进而开启了国民财富发展的新篇章。1992年到2002年期间,江泽民同志全面促成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链接,并探索了一条利用现代股份制发展经济的财富道路。在反思“双轨制”带来的矛盾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由计划理性而来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已走到尽头,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6],到十五大首次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7],再到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的重要论断,我国进一步确认了多种所有制财富主体对实现共同富裕所作的突出贡献。2002年到2012年期间,胡锦涛同志以“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为落脚点开启了从“国富”导向“民富”的历史新阶段。他提出的“以人为本”、“发展为第一要义”、“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等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共同富裕思想,不断推动我国的共富实践迈向新台阶。

(三)从党的十八大至今:共富实践的全面深入阶段

从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至今,我党以巨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勇气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践推向了更高的历史阶段。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8],进而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优质的平台。同时,我国还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格局来驾驭和导控资本,由此最大化地激活了市场要素,最大限度的释放了财富的增长效应,最深层次地发挥了人民创造财富的能动性。这在本质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9]的使命担当。2012年12月我国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意见》,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实施精准扶贫的发展方略,将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在找准共富实践的痛点、难点的过程中实现了精准扶贫和共同

富裕的有机统一,由此将我国的共富实践推向了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不仅要继续解决人民在物质文化上的需要,还要注重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经验反思:新中国70年共富实践的历史总结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边改革、边实践、边认识,再到注重理论先导、科学抉择和超前规划,我们始终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探索驾驭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和将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前行,这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路径、保证和导向。

(一)共富前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通过70年的共富实践,党和国家深入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处理好社会基本矛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衍生了一条拒斥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道路,这种通过精巧设计和依靠行政命令规划两大部类生产和再生产环节的循规蹈矩运作模式,尽管能在短期内组织起完备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但却不能最大化地驱动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我国正是在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过程中,通过艰辛的、革命性的、伟大的共富实践,突破“苏联模式”的弊端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而在互构社会主义与资本、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扫除了“资本就是罪恶”的非理性认知,同时加深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来实现共同富裕的自觉性和能动性。邓小平猛烈地批判了那种“有社会主义名字就光荣”的物化思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这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条件下的少数人富和多数人穷的扭曲图景,也不是循规蹈矩的“苏联模式”下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共同贫穷,而是生产力水平极大解放发展并以“不落下一个贫困人口”为根本原则的共同富裕。因此,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和共同富裕的前提,我国才能彻底告别那种单向度强调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凡是”思维,走出计划理性下的祝福意识而形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性下的忧患意

识,进而在兼顾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全面将资本放置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最大化运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共富路径: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

资本自诞生以来就赋予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这种资本增值的内在驱动力将人“自然本性”之中的财富创造欲望最大化地激发了出来。事实证明,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已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经济手段。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不仅清晰地认识到商品、资本、市场及其相应的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程度的异质通约性,还基于资本具有“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内在二重性“脱钩”了资本就等于剥削的错误认识。就如“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11]一样,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并非谴责资本本身,而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发挥的非正义道德功能攫取剩余劳动的过程。同样,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消灭剥削”内容也并非要“消灭资本”,恰恰是要在探索资本运行的正确轨道及其限度的过程中透视由资本扩张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而在开发、节制和驯服资本的过程中不断变革与现存世界不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因此,我们断不能害怕因资本唤醒人们对财富占有的贪婪而拒斥资本对人类发展的进步作用,相反要从资本合理性的角度反思和关照我国的共富实践现实,并制定法律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利用资本手段追求和创造财富合理合法性。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要充分发挥资本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中创造剩余价值的功能,并在走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内塑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扩大国外资本与国内资本的有机耦合程度,同时将对国民经济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影响的资本控制权掌握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和政府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治力量将资本追求自身利润的活动纳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实践的逻辑序列。

(三)共富保证:探索驾驭资本的所有制结构

我国在利用资本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摆脱了东方落后大国的时空定位并进入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发展时期,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资本逻辑正反演绎而来的“中国现代化悖论”也是实现共同富裕中不可回避的矛盾挑战。要阻滞资本悖论的幽灵附体,就必须结合资本运行中各类财富的所有权乃至生产资料的转让权、租赁权和收益权等积

极探索驾驭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创造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系列体制机制,将资本逻辑推演而来的“中国现代化悖论”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践离不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要素市场、交易市场和流通市场内的共生互构,因此我国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2],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在法律保护下以公平、公正、公开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进而在克服资本悖论、追求经济正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那种统分结合、层次多元的资源配置方式。同时这种所有制结构还必须确认“多重人格资本家”在市场体系中的扩张边界,坚决禁止资本力量介入政治领域,避免各类市场主体和利益集团自由均等地嵌入各个社会领域和支配各种资源的情况发生,否则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宏愿将会失去政治经济体制的保障而成为形而上的道德符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驾驭资本的所有制结构必将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四)共富导向:将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

人类社会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过一种理想的、完美的、共产主义式的“自然、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发展形态,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毫不动摇地利用资本和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最大限度地将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保证全国各族人民共享财富发展的成果。基于新中国70年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考量,我国从“国富”导向“民富”的过程中建构了不同内容的财富分配体制机制,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3]的财富分配方式,到“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4]的指导意见,再到“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率参与分配的原则和制度”,直至“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15],我们都在反思过去和与时俱进的双向结合中逐步实现了将财富有效复归于广大人民的历史使命。同时,我们若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财富向广大人民的复归,纯粹依附于政府有形的手在税收、社保、财政转移支付等领域发挥的作用往往支撑不起全国性的经济系统,我国还需要有一套社会自发并受政府掌控的市场分配体系,进而在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异质同向的功能发挥中形成类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分配格局,进一步通过各种与社会

主义制度内在契合的财富分配方式将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最大化的复归于劳动者自身,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三、现实挑战:新时代走向共同富裕面临的伟大斗争

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利用、开发、引导、控制、节制、规范和驯服资本而开创了国富民富双向涌流的壮观局面,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资本逐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以及被国际资本力量盘剥的风险依然横亘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之中。

(一)在思想认知领域面临多元社会思潮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现离不开合理合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的社会主体,一旦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被多元社会思潮所裹挟而不能保持清晰的认识,我国的共富实践很可能被或隐或现的多元社会思潮所影响、左右甚至被操控,进而阻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践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具体说来,对我国的共富实践构成较大挑战的社会思潮主要包括三类。其一,来自新左派思潮的挑战。这种极左的社会思潮从乌托邦式的抽象理性出发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富”逻辑,主张在平等和公平的核心原则下通过“文化大革命”式的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重组政权,进而实现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并对社会财产进行再分配,说到底这种非理性思潮也就是在否定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勾连中向非自然简单状态的全面倒退。其二,来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这种以抽象人性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学说为代表的西方启蒙主义思潮伴随着中国整个共富历程,这种思潮妄图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把中国共富实践中所出现的腐败、官僚主义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归因于社会主义政治上的集权,同时以显性的政治军事霸权和隐性的意识形态较量威逼利诱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彻底施行西方的宪政制度。其三,来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挑战。这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轴心的折中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混血儿,其主张用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政治上的多党制与选举制”^[16]统合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促使中国把目光转向第三条道路,进而通过财富“二次分配”达到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性标准。

(二)在国内经济领域面临资本的逐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

资本作为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体现的是物与物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永不遏制追逐逐利最大化的扩张本能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推动人类从封建社会占主导的野蛮、贫穷、节操和服从观念向现代社会所必备的平等和个人权利观念的转变,进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资本的现代性确认将人的贪婪欲转变为对人性、自然和社会的摧残,它把资本的经济权力转变为侵蚀政治权力和社会公益的手段,形成了资本追逐自身扩张的资本力量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中国的共富实践之中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本占有一切和创造一切的通约性导致各类市场主体试图利用各种交易渠道、体制机制漏洞、暗箱操作甚至行贿手段收买公共政治权力,进而冲击社会的正义、道德并私吞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二是资本与权力的相互勾兑诱发了私人资本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对垒,当社会的正义道德理性被膨胀的积累欲所压制、挫败,人作为万物尺度的逻辑序列位置便会消解在单向度受奴役的社会发展之中,自然也会在非理性的野蛮扩张和掠夺中走向枯竭进而出现生态危机;三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由于起步较晚且缺乏健全的市场法治传统,为某些资本串谋操纵市场提供了非法条件,市场上出现了资本操纵股市、楼市、汇市来合谋吸取大众血汗、绑架大众利益的局面;四是作为市场权力放大器的资本在“先富逻辑”下促使我国摆脱了落后的东方大国地位,但实现“先富逻辑”导向“共富逻辑”的实践过程仍由于缺少必要的监控和理念支撑,诱发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和两极分化的问题等。可以说,上述由资本“无剩余不追求”的增值秉性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无疑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三)在国际交往领域面临被国际资本力量盘剥的风险

资本的“脱域性”反映资本除了扩张外别无选择的增值秉性,它能轻而易举摧毁国家的时空坐标而吸吮别国创造的剩余价值,我国在驾驭资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规避由各类“脱域性”外企资本带来的风险挑战。一是以私有制为轴心的外企资本无法摆脱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且隐匿着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当这种外企资本被引进中国后则可能使中国出现局部性生产关系被重新定义和改写

的情况,导致资本剥削劳动者的现象发生;改革开放后我们迫切需要外国的生产技术、设备、工艺乃至研发技术,客观上不能避免局部性的劳资关系不和谐现象。二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利用生产、销售和研发环节创造的劳动价值面临被国际金融、科技、品牌和营销网络切割的风险,同时还要承担外企资本扩张中造成的低工资、低待遇、低福利、高污染等财富发展中的市场化代价。三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起步较晚,在国际“游戏”规则制定中处于劣势地位,导致国内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舞台合作竞争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可借助“301条款”对中国展开“非正义”的反倾销调查并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进而对中国的共富实践造成影响。总之,上述国际国内的资本扩张诱发的现代财富发展悖论,使得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类资本在“血腥的征服、阴毒的怀柔或貌似人情入理的整合‘他者’的本性”^[17]中不同程度的被盘剥。

四、路径选择:化解“共富挑战”的现实方案

面对共富实践中的各类挑战、矛盾和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践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规划了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目前可将其分为理论、实践和战略三重维度。

(一)理论维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

党和国家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出发点就是实现经济正义和国富民强的发展目标。基于此分析社会形态演变而来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再结合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考量,必然诞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这是支撑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石。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思想。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无法避免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诱发了人类、自然和社会中的二律背反问题。这启示我国在借鉴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优秀成果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富理念来驾驭导控资本力量,始终把人民的福祉、人民的需求、人民最迫切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共同富裕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根本的价值立场,也是习近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8]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我国在共富实践中要避免非公资本追逐价值增

值而罔顾社会整体利益的消极后果,就必须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生产关系能在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生产力和驾驭引导私有资本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复归于广大人民群众。这就要求我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土地等公共资源的公有制,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乱国之策;坚持对社会生产中具有全局性、关键性和系统性的行业领域实现公有制,反对由私人资本的操控;坚持用社会主义公共权力来引导、监管和驾驭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集团,反对资本权力介入公共权力的情况发生;坚持按财富贡献度分配、按劳分配和多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等。三是坚持市场与政府辩证关系的理论。习近平强调我们在处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发挥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是我国利用市场中的资本力量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中体现。尽管市场体制机制下的资本扩张可能会导致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但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并最大限度地制约资本的消极作用,凸显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效应,将促使中国避免各种资本扩张悖论中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实践维度: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攻坚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是基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而谋划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指南,其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对我国的共富实践具有非凡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考量,开辟了世界历史上以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的先河。他指出,精准扶贫“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19],重点是要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在实践中,我国通过“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等扶贫理念和路径设计,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吃穿住行、医疗和义务教育上的基本需求,总体上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科学规划和脱贫攻坚实践行动都是史无前例的,其不仅继承了经典作家追求人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还基于中国的现实拓展了共富实践的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揭示了户籍、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不完善的体制机制问题是造成中国未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因所在,

还在构筑扶贫战略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中革除了共富实践中面临的体制机制弊端,建立了长效稳定的共富机制。从目的论上讲,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内在契合了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尽管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以稳定脱贫”^[20],但贫困问题依然是阻滞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拦路虎”。客观审视共同富裕发展阶段的时空方位,完成精准扶贫的目标只是达到了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通过精准扶贫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谋划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道路才是关键,否则精准扶贫方略的实施就不能支撑起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因此,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精准扶贫方略并不止于帮扶贫困人口暂时脱离困境,而旨在通过对症下药输送致富思维、致富路径和致富能力,确认贫困地区和帮扶对象选择好符合自身又契合现实的攻坚致富道路,形成其赖以依靠的可持续共同富裕之路,这是我国在精准施策、明确靶向的过程中凸显精准扶贫最佳效益的关键所在。可以说,习近平精准扶贫政策的超时空弹性既延续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发展和创新了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和道路选择。

(三)战略维度:新经济发展战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布局

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既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不能脱离现实而追求形而上的抽象满足,更不能脱离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战略布局。新时代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拓的新发展空间是战略布局的重要方面,其统筹着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

国内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宏伟布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指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必须利用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来适应经济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其内在的契合了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不可持续的工业资本全球扩张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受限等后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是在吸取资本主义工业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顶层规划出的一条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道路,其必将为我国的共富实践创造充裕的物质条件。二是协调发展战略。这主要包括区域协调、城乡协调、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协调发展战略等,其核心导

向是解决共富实践中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进而在改善和消除地区、行业和人群收入差距的过程中追求财富向人民群众的复归。从根本上来讲,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驾驭和导控资本的过程中,解决财富发展不均衡和利益分割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共同富裕新战略。三是生态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坚持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作为国民财富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社会主义共富发展空间格局需要天蓝、山绿、水清和环境优美的战略基础。

国际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宏伟布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并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成果,同时还要在克服资本扩张悖论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外开放战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基本方略扩充为一系列的宏伟目标,包括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向开放、互联互通的建设思路,还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带一路”等系列对外开放战略,这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举措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鲜活展开。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马克思揭示出主要发达国家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依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和殖民扩张的方式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这种霸权主义主导下的资本全球积累结构,造成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中国要融入国际体系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国际垄断资本的盘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国际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来阐释中国共富实践困境,进而倡议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有助于我国在共富实践中化解被国际资本力量剥削的风险。

参考文献:

-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7.
-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 [3]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3.
- [4]中共中央文件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89.
- [5]中共中央文件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377.
- [6]中共中央文件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641.
- [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
-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3.
- [12]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 [13]中共中央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655.
- [14]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
- [1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217.
- [16]鲁品越.影响当代中国的三大乌托邦思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 [17]张雄.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J].哲学研究,2006(10).
- [18]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11-25.
-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84.
- [20]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

(责任编辑 岩 芜)